



不到一倍，工业生产还比抗战之前更加萧条。很明显，金融机构猛增，并非人口增长和生产发展需要，而是旨在谋取暴利的投机活动。本质上，金融业本身不创造财富，它通过出借资本来获利，参与现有及未来财富的再分配，这也意味着金融具有“寄生”与“造血”的双重特征。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贵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无奈地成为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从中国百姓身上抽血的“针孔”。

在上海，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外国银行通过主导外汇行市和出口外币外钞，控制中国货币金融，垄断中国市场，也利用各种政治贷款，影响中国政治。1949年留在上海迎接解放的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奚伦这样描述当年的金融业务，中外银行本应站在居间位置，调节国际金融往来，服务国际贸易，可上海金融圈却是外国银行控制运输、保险，连利率、所得税也是他们的天下，让中国人去适应他们的条件，“在华资银行户头上，向来只有‘我们资金流入’外国银行的‘往’，很少有外资银行拨付我们银行账面的‘来’”。常见的上海外贸模式是：外国进口商从中国进口，只要开纸空头信用证，在上面片面提出苛刻条件，要挟中国制造商按条件把货物包装起运，等外商拿到提单后才开汇票，而中国进口商要向外国买货，情况正好相反，首先必须填好购买证，办完结汇手续，把美元英镑送到外商手里后，才能发货，“因为在帝国主义者眼里，总认自己有信用，看不起中国人，便营造出这样一套‘殖民地贸易’式的‘购买证制度’，把风险全部转嫁到中国人身上”。

而国民党反动的金融政策更让上海城市经济“气血两亏”。内战三年，国民党当局犹如资不抵债的银行，眼见公债打了六折五折都无人问津，只能乞灵于印刷机，靠滥发法币筹措军费。1947年，“流量作家”张爱玲拿着千字六万元的稿费，也只敢奉行“每月生活费不超百万元”的原则。到了1948年，国民党异想天开，以法币按三百万换一的比率，命令人民兑换金圆券，并强迫人民以黄金向国家银行兑换金圆券。结果，上海市民的黄金尽被搜刮而去，蒋介石逃亡台湾，把20多万亿金圆券丢在



上海解放初期，解放军战士在中国人民银行第九办事处门口执勤。

市民衣袋里。市面上，商业活动沦为囤积居奇、买卖金钞、放高利贷以及“踢皮球”“卖栈单”“抢帽子”等买空卖空的行为，据估计，此时申城至少有20万人以金融投机为业。上海，这支“金笔”，属实与人民无关。

人民币为人民服务

1949年5月27日，江海关升起红旗时，尚未洗去征尘的三野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陈毅就对军管会人员说：“政治作战的比例上，我们是九个人打一个蒋匪军，而在军事上，我们是五个打一个匪徒。在经济作战上，我们是更要好好学习，要依靠着市民大众的合作来恢复上海繁荣。”还没管理过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共产党，能在金融上战胜那帮老奸巨猾的敌对势力吗？

解放军一进城，人民政府依法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的18

解放军一进城，人民政府依法接管国民党官僚资本的18家银行、19家保险公司和5家官商合办银行。通过一系列依法接管和改组，在上海金融市场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银行的领导。

